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实证研究

许传新¹, 许若兰²

(1. 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四川成都 610059; 2. 成都理工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四川成都 610059)

摘要: 本文根据抽样调查的结果, 探讨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状况及影响因素。本研究发现, 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居民的生活圈, 存在着一定的社会隔离。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城市生活体验、社区参与程度、相对剥夺感对其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感有显著性影响。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城市居民; 社会距离;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2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7)05-0039-06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New Migrant Workers and Urban Residents

XU Chuaxin, XU Ruolan

(1. School of Art and Law,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Sichuan Province, China, 610059;

2. Center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Sichuan Province, China, 610059)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in a survey conducted in Chengdu, the capital of Sichuan Province, China,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new migrant workers from rural areas have not yet been fully melted into the life of urban residents. They are somewhat marginalized from the mainstream urban cultur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ose factors such as gender, one-family-one-child background, urban life experienc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sense of marginalization all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se migrants understanding of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urban residents and mainstream urban culture.

Keywords: new migrant workers; urban residents; marginalization; related factors

一、引言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 他们大多没有务农经历, 初、高中毕业, 职业期望值高, 不愿干脏活、累活和收入低的活。打工不再只是为了赚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生孩子, 而是带有“闯天下、寻发展”的目的^[1]。对他们而言, 打工不再是单纯为了讨生活, 而是为了“享受都市生活, 实现都市梦想”。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又不断消解着他们对家乡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 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也使他们渐渐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总之, 比起第一代农民工, 他们真正成了既融不进城, 又不愿回乡的“边缘人”。他们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是

收稿日期: 2007-03-10

本文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 2005 年一般项目“构建和谐四川, 关注社会变迁中的青少年问题”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许传新(1975-)男, 湖北宜昌人, 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青年社会学、人口社会学。

反映社会是否和谐发展的标志之一。因此，就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问题展开实证性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设计

(一) 社会距离的界定

社会距离 (social distance) 是一个内涵丰富、高度抽象的概念。郭星华等人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分解成三个层面，即向往程度、排斥预期和整体感觉^[2]。本项中，我们将之定义为存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空间中的、在与城市居民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心理距离。并从交往状态、交往意愿、接纳预期三个维度进行测量，具体指标见下文。

(二) 本项研究中的影响因素

一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社会特征，具体包括：性别；教育程度，这里区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及以上四个等级；是否独生子女。

二是城市生活状况，具体包括：进城打工的时间长短；城市打工收入的满意度和城市工作职业的满意度，这两个指标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并进行正向5级赋分。

三是社区参与程度，即是否参与当地社区组织；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这个指标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并进行正向5级赋分。

四是相对剥夺感，包括对在城市是否经常受歧视、是否经常感受到领导不公平的主观评价，这两个指标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并进行正向5级赋分。

(三) 数据来源

本项研究根据“成都青年农民工状况调查”的资料进行分析。“成都青年农民工状况调查”于2006年7~8月在成都城区以28岁及以下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通过随机抽样和“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在成都市农民工相对集中的4个城区8个街道抽取600名青年农民工，然后由调查员对他们进行了结构式访谈的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576份，有效率为96%。

三、统计分析结果

(一) 社会距离状况

表1大致表明，调查对象中，有1/3左右的人经常与城市居民交往，真正觉得与城市居民有心理隔阂占23.5%；对与城市居民交往充满向往的接近30%；有接近一半的人感受到了城市居民对他们的排斥。

表1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距离量表

指标	%		
	1 是	1 否	3 说不清
1. 是否经常与成都同事一起娱乐?	38.1	14.9	47.0
2. 是否经常与社区当地居民来往?	32.0	16.3	51.6
3. 你和单位里成都人的关系是否亲密?	34.4	34.8	30.8
4. 你认为你对你认识的城市人是否了解?	31.3	31.6	37.1
5. 你是否觉得你与市民之间有一种心理隔阂?	23.5	30.7	45.8
6. 内心是否愿意与房东一起住?	29.2	13.5	57.3
7. 未婚者是否考虑过与成都市民谈恋爱?	27.6	34.3	38.2
8. 你认为所在社区的居民是否欢迎你们在这里居住?	35.4	47.4	17.1
9. 你认为城市人从内心里来讲是否愿意和外地人做邻居?	20.9	52.1	27.0
10. 你们在这里居住，是否让城里人感到不自在	45.5	14.3	40.2

虽然我们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的大致倾向，但指标较多，且相互之间存在相关，造成信息重叠，无法进行有效的分析，必须对其进行精简，保留最有代表性且概括力较强的几个指标，它们之间彼此独立，以此简化分析。据此需要，我们分别对以

上量表的指标进行新的赋值^①，然后进行因子分析。

表2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因子摘要表

指标	提取因子			共同度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2. 是否经常与社区当地居民来往?	-	0.630	-	0.564
3. 你和单位里成都人的关系是否亲密?	-	0.750	-	0.638
4. 你认为你对你认识的城市人是否了解?	-	0.683	-	0.527
6. 内心是否愿意与房东一起住?	-	-	0.691	0.542
7. 未婚者是否考虑过与成都市民谈恋爱?	-	-	0.798	0.643
8. 你认为所在社区的居民是否欢迎你们在这里居住?	0.579	-	-	0.448
9. 你认为城市人是否愿意和外地人做邻居?	0.745	-	-	0.594
10. 你们在这里居住, 是否让城里人感到不自在?	0.814	-	-	0.664
新因子命名	接纳	交往	交往	
	预期	状态	意愿	
特征值	1.688	1.566	1.366	
方差贡献率 (%)	21.09	19.58	17.07	
累积方差贡献率 (%)		57.74		

我们对这 10 个指标进行 KMO (Kaiser-Meyer-Olkin) 检验, 通常认为该值在 0.5 以下就不适合做因子分析, 这 10 个指标的 KMO 值为 0.740, 巴特利特球状检验 (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 的卡方值为 379.81, 自由度为 28, 在 0.000 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这 10 个指标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表 2 的结果表明, 8 个指标被概括为 3 个因子, 根据每个因子所包含的指标内容, 分别命名为接纳预期因子、交往状态因子和交往意愿因子。指标的共同度除一个接近 0.5 以外, 其余都在 0.5 以上, 3 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57.74%, 达到了因子分析的要求。

我们以每个指标的因子得分函数系数为权数, 计算因子得分; 又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 计算社会距离的综合得分。根据我们采用的赋分方式, 每一指标的分值是在 [-1, 1] 区间的取整变量, 因子得分在每一指标上的理论最大值为 1, 最小值为 -1, 即该指标对因子的贡献率为 100%。因此, 如果因子得分为正值, 则表明在社会距离上倾向于融入; 值越大, 倾向越明显, 社会距离越小。如果因子得分为负值, 则表明在社会距离上倾向于排斥, 绝对值越大, 倾向越明显, 社会距离越大。统计分析发现, 接纳预期的均值为 -1.3392E-02, 小于 0, 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认为城市居民对他们是排斥的, 该值的绝对值相对较小, 说明倾向相对较弱。交往状态的均值为 3.212E-02, 大于 0, 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交往状态方面是倾向于好的。交往意愿的均值为 -1.3433E-02, 小于 0, 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拒绝与城市居民交往, 该值的绝对值相对较小, 说明倾向相对较弱。社会距离的均值为 -1.6773E-17, 小于 0, 说明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融入到城市居民群体中去, 该值的绝对值相对较小, 说明倾向也相对较弱。由此可以看出, 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以后, 他们还没有较好地融入到城市居民中去。虽然他们与城市居民同处于一个共同的地理社区, 但他们之间仍然缺乏心灵的沟通、情感的交流。他们之间虽然可以共享地理空间, 甚至居住于“同一屋檐”下, 但两者在精神上仍是一种“两张皮”关系, 各自生活在各自的精神世界里。从而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形成一种“共同地理空间中的精神隔离”。

① 本文的赋分方式为: 指标 10 计分方向与整个量表的计分方向相反, 在其赋分之前, 我们先对其正向计分。这样以后, 我们将“是”赋+1分, “说不清楚”赋0分, “否”赋-1分。得分越低, 社会距离越大, 得分越高, 社会距离越小, 中间态度为0分。

(二) 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考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我们以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社会特征、城市生活状况、社区参与状况、相对剥夺感做自变量,以接纳预期、交往状态、交往意愿、社会距离的得分做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到表3的结果。

表3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Beta 值)

自变量	接纳预期	交往状态	交往意愿	社会距离
自身特征				
性别	-	0.122*	-	0.107 [†]
是否独生子女	0.128*	-	-	0.109*
文化程度	-	-	-	-
城市生活状况				
进城时间长短	-	-	-	-
城市收入满意度	-	-	0.108*	0.117 [†]
城市职业满意度	0.143*	0.136**	0.118*	0.150*
社区参与状况				
是否参加社区组织	-	0.107*	-	-
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	0.176*	0.175**	-	0.209***
相对剥夺感				
是否经常受歧视	-0.101*	-0.144**	-0.129*	-0.112*
是否经常感到领导不公平	-0.102*	-0.106*	-0.111*	-0.034
R ²	0.113	0.140	0.107	0.129
F 值	4.641***	5.809**	4.079***	4.866***

注: * 0.01 < sig < 0.05, ** 0.001 < sig ≤ 0.01, *** sig ≤ 0.001。

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见表3),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 从回归模型中可以看出,以本研究中规定的个人特征、城市生活状况、社区参与状况、相对剥夺感等指标做自变量来预测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感,可消减 12.9% 的误差;预测新生代农民工的接纳预期感,可消减 11.3% 的误差;预测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交往状态,可消减 14.0% 的误差;预测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的意愿,可消减 10.7% 的误差。各个回归模型 F 值分别为 4.866、4.641、5.809、4.079,显著性水平为 0.000,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各回归模型有意义。同时也不难看出,还有一些相对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本项研究中没有被发现,这也是以后深入研究所努力的方向。

(2) 个人特征的影响。男性比女性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整体感觉要小一些,交往状况要好一些;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整体感觉要小一些,接纳预期要高一些。

(3) 城市生活状况的影响。表现为新生代农民工对打工收入的满意度越高,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整体感觉越小,交往意愿越强烈;而对城市职业的满意度越高,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整体感觉越小,交往状况越好,交往意愿越强烈,接纳预期越高。

(4) 社区参与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有正向影响。参加过社区组织的新生代农民工比没有参加过社区组织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交往状态要好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区活动频率越高,与城市居民社区距离的整体感觉越小,交往状态越好,接纳预期越高。

(5) 相对剥夺感对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有负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以后,感受到歧视的频率越高,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整体感觉越大,交往状态越差,交往意愿越

弱, 接纳预期越低。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以后, 感受到领导不公平的频率越高, 交往状态越差, 交往意愿越弱, 接纳预期越低。

四、对研究发现的进一步讨论

1. “社会交往补偿”

“社会交往补偿”理论认为, 由于独生子女缺乏兄弟姐妹这一客观家庭条件, 使得独生子女到了青少年时期“被迫”更多地与同学和同龄伙伴往来, 从而更好地习得了与“他群体”交往的规则, 提高了交往能力^[3]。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以后, 他们主要面对的是一个不熟悉的、充满着“陌生人”的“他群体”。他们早期在农村社会中所建立的那些由自己的邻居、同学所构成的“我群体”被远远地抛在了家乡; 他们在乡土社会中所遵循的那些规范和观念, 也在这个充满陌生人的城市社会中变得愈来愈不适应。他们原来的那些社会联系由于他们外出打工的行为而被无可奈何和强制性地割断。这样所造成的一个直接的后果, 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在城市中由此形成了一种社会和心理上的结构性紧张和危机。面对这种结构性的紧张和危机, 为了在城里生活、适应和发展的需要, 他们必须学会和城市里的“他群体”打交道。由于独生子女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城之前, 就更好地学会了与“他群体”交往的规则, 在与“他群体”交往中得到过更好的锻炼。所以当他们进城以后, 当面对突如其来的庞大的“他群体”——城市居民时, 他们所产生的紧张、压力要相对小一些, 交流起来要顺畅一些。因而他们所感受到的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也就会相对于非独生子女农民工要小一些。

2. 城市生活体验的重要性

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认为, 自我在等级制结构中的位置, 是决定个人获取更好社会资本的因素之一。他将位置区分为先赋位置和自致位置, 前者是指自我继承的位置, 通常来自父母; 后者是指自我在后天获得与占据的社会位置和社会角色^[4]。对于进入城市社会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 先赋位置是他们与城市居民产生社会距离的根源之一。所以他们要想获得城市人的接纳, 缩小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 必须提高他们在等级制结构中的自致位置。按照社会学家的观点, 衡量个人社会位置的主要标准有三, 即财富、权力与声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在城乡二元社会的中国,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 短期内获得制度上的平等待遇, 享有与城市人同等的权力是不够现实的。这就意味着他们想通过获得权力来提升他们在城市社会等级中的位置这一途径被切断。因此通过社会经济地位的实际提升来缩小他们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是他们最为直接、最现实的选择。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收入和职业的满意程度越高, 就意味着他们弥补先天制度地位之不足越成功, 意味着通过财富的积累和声望的提高实现了他们在城市社会等级中位置的爬升, 以此拉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感。

3. 相对剥夺感

埃利亚斯 (Norbert Elias) 在研究胡格诺教徒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污名化 (stigmatization) 过程, 即一个群体将人性低劣部分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 这完全是两个群体之间特定权力关系的结果^[5]。这种污名化的过程进一步固化了两大群体的社会位置, 加深了他们之间的鸿沟。

新生代农民工涌入城市, 对城市的物质供应、社会治安、环境卫生、交通运输等等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各方面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直接分割了城市居民的利益。而城市人为了将这种“利益让渡”减少到最低限度, 于是就在经济方面尽可能的进行盘剥, 拖欠工资、克扣工资、延长劳动时间、与城市人同工不同酬等等, 使新生代农民工深深体会到了一种不公平感。在社会人格方面, 对农民工这种污名化过程相当普遍地存在着。肮脏、粗鲁、野蛮、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这些人性低劣部分, 似乎天然正当地加在农民工身上。于是, 当新生代农民工满怀希望进入城市以后, 他就不再可能作为一个自主的人, 而是必须作为受

歧视群体、劣等群体的一分子开始与城市居民的日常互动，他们必须要面对甚至接受、固化对这些先于他们形成，而实际上可能与他们并没有直接关系的歧视、排斥和“污名”。正像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只能占据这样一个先定的受歧视位置，他们所掌控的交际资源因此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他们无法进入他们向往的城市生活圈，他们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似乎就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4. 社区参与的促进

社区组织和活动是新生代农民融入城市、缩小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社会化组织载体。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以后，通过参加社区组织，参与社区活动，不仅仅是他们自身认同城市社区的一种标志，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被城市社会所接纳。这样使得他们在心灵上有了一种归属感、安全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市民权，从而缩小了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所以我们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随着“小政府、大社会”管理体制的逐步建立，将有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以后，参加当地的社区组织，这样会加速他们市民化的进程，从而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中去。

参考文献：

- [1] 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 [J]. 社会学研究, 2001, (3) .
- [2] 郭星华. 储卉娟. 从乡村到都市: 融入与隔离——关于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 [J]. 江海学刊, 2004, (3) .
- [3] 风笑天. 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及其结果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 (6) .
- [4] 林南 [美], 张磊译. 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5] 杨善华.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责任编辑 崔凤垣]

(上接第 26 页)

四、思考与建议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计划生育信访工作与和谐社会建设关系密切，加强计划生育信访工作，能够促进公平正义，增强社会和谐。针对计划生育信访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 加强对国务院《信访条例》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的宣传。要把《信访条例》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宣传纳入全省法制教育，宣传“五·五”规划（《山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促进依法信访，实现社会和谐。

(二) 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减少信访。以修改《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为契机，制定符合各类人员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政策；通过政府协调，相关部门各负其责，密切配合，确保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政策落实到位，促进社会和谐。

(三) 完善计划生育工作机制。大力整治乱收费、乱罚款、收取押金、搭车收费、强迫服务收费和治理违反计划生育“七个不准”行为；在提高管理服务质量上下工夫；相应的责任单位、责任科室按照归口办理要求，及时处理信访案件，减少重访、越级上访，提高信访结案效率。

(四) 及时发现和处理计划生育信访反映出来的问题，把矛盾问题化解在基层。及时处置信访工作反映出来的热点难点问题，提高群众满意度。

(五) 强化对计划生育信访工作的领导。摆正计划生育信访工作的位置，人员配备要合理，经费和待遇要落实，切实关心信访工作人员的成长与进步，确保领导到位、措施到位、工作到位。

[责任编辑 王树新]